经典作家

阿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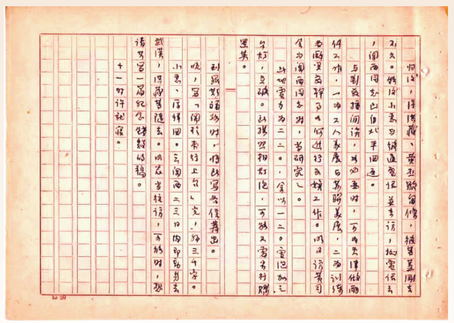
——纪念——

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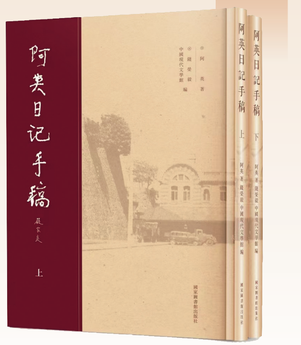
阿英，原名钱德富，又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作家、学者。阿英在青年时期投身五四运动，并广泛参与革命宣传活动。1926年10月，阿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与蒋光慈等人创建“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创作《麦穗集》《文艺批评集》等文学评论，倡导“革命文学”。1928、1929年阿英出版短篇小说集《革命的故事》、中篇小说《一条微浪》、叙事长诗《暴风雨的前夜》等多部现实主义作品。1930年，阿英与鲁迅、夏衍等人共同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时期，阿英与郭沫若、夏衍创办《救亡日报》，编印《文献》月刊。1937年阿英所著《晚清小说史》出版。阿英还积极参与电影发展事业，创作《碧血花》等剧本。新中国成立后，阿英研究、整理中国民间艺术，梳理晚清文学史，编写出《鸦片战争文学集》（上、下册）等九卷著作。

今年是阿英诞辰125周年，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吴述桥、王秀涛、鲍国华，以及阿英之孙钱荣毅撰文，评述阿英多彩的写作人生，追怀其为文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编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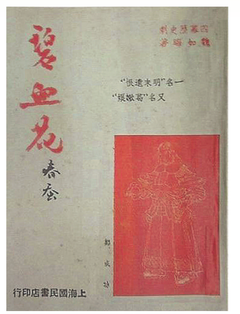


阿英日记手稿



《阿英日记手稿》，阿英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5年3月

《晚清小说史》，阿英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初版本



《碧血花》，鲍知畴（阿英）著，上海国民书店，1940年2月

《李闯王》，阿英著，东北书店，1948年4月初版本

本专刊由《文艺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

工厂文艺实践活动的重要探索者

□吴述桥

工厂文艺是党领导工人阶级开展的重要文化实践，是新中国重要文学史现象。我们对阿英的印象，主要是批评家、戏剧家和史料研究专家，此前虽有一些谈及阿英领导大连和天津工厂文艺工作的文章，但直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今年推出《阿英日记手稿》，我们才更清晰和完整地看到他从事工厂文艺实践的有关史实。

阿英在大革命期间曾经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本来十分熟悉工人运动，而让他得以在工厂文艺运动中大显身手的还是在大连和天津工作时期。解放战争爆发后，阿英根据华东局指示抵达大连，于1947年9月担任大连市文委书记。甫到大连，阿英就敏锐地发现，党的工作已经开始进入“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他主动组织一部分同志进入工厂，实验工人文娱工作。1949年7月，阿英开始成为天津文艺界领导人，同样大力开展工厂文艺工作。

在大连和天津工作期间，阿英为东北解放区和新中国工厂文艺工作作出了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贡献。《阿英日记手稿》当中以《大连日记》和《天津日记》文字最多，这两份日记恰好保留了他在大连和天津工厂文艺工作的鲜活记录，可谓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厂文艺实践的重要历史见证。

1950年出版的《工厂文娱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是阿英在大连组织工厂文艺活动的实验总结。他在该书中纠正了过去对工厂文艺工作的六种错误看法，如认为文娱工作完全是“无聊消遣”，或者只是为了纪念活动，影响工业生产等。阿英是带着强烈使命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因而不难理解他将那些曾经归属于日常娱乐的工厂文娱活动改为“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以唤醒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阶级觉悟，培养新的劳动观念，提高艺术水平的一种政治、文化——艺术的翻身事业”。

将工厂文艺工作看成是提高无产阶级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织形式，这并不是阿英对革命文艺理论的简单挪用。作为文委书记和工厂文艺运动的领导者，阿英的主要使命是革命文艺宣传，革命往往需要对日常生活观念有强大的洞察力。他对工厂文艺工作的看法，有很多可以从《大连日记》中得到印证，完全是他工作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在保留下来的八个月日记当中，阿英常常要与各级领导各个部门打交道，讨论人事安排，争取经费，指导业务等等，还要处理专业写作和指导工人写作之间的两难，如1947年12月7日日记记载：“沙惟同志等脱离组织工作，专业写作之念甚强，拟于会时解决之。”比较阿英的著作和日记可以看到，阿英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具有从日常生活和事务当中提炼思想理念的能力。

实践证明，阿英具有非常好的组织协调能力。他的组织经验均被总结到了《工厂文娱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下厂与创作》等著作当中。他系统论述工厂文艺工作的意义、任务、组织领导、业务指导和文艺干部的修养等问题，还到沈阳、天津等地作经验分享，举办工人画展，主编出版工人文艺习作丛书27种，以实践成果为新中国工人文艺运动提供借鉴。

如果只看阿英有关工厂文艺的相关论述，我们很可能会将阿英看成解放区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中的一员，他们显得普遍而抽象；若结合日记手稿来读，则会将其还原成为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将日记手稿和工厂文艺工作报告（即《工厂文娱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对比即可发现，阿英对工厂文艺运动的看法和建议都极具针对性，大多是针对工厂文艺工作可能遭遇的实际问题，是一份特别具有现实感的工作记录，而工厂文艺完全是生活在历史当中的有血有肉的人的艺术实践。

阿英对文艺工作领导问题的思考可以说融入了自己的组织体验。阿英说：“在领导上，当进行一种工作的时候，最好能随时争取工厂行政方面和工会的号召与帮助。任何一种文娱活动，只要广方重视，工会帮助号召，没有搞不好的。”阿英日记手稿记载了大量工作事宜，常见阿英和工厂各级领导打交道，多涉及到钱款、人事和具体业务等问题。1947年9月29日，阿英等人准备到大连建新工业公司做文艺运动，当日日记载：“旋赴袁厅长处晚饭，七时至朱部长处，更征商建大问题。我们决定到甘井子工厂区做工人文艺运动。明日出招待所，解决衣服问题、病及其他问题。”再如1947年11月29日记载：“晚饭后，工程部陈部长来，约布置生产会场，约筱等星一到大连同去。”后续几天日记均连载此事。

如果说以上日记谈到的还是阿英本人或者说工厂文艺的组织领导者，那他谈业务教育和干部修养则更能体现其对工人阶级和文娱干部的理解。阿英是早期共产党员，也是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他对工人和干部的看法当然持有阶级观点，但他主张要“研究工人心理，和工人群众心理的问题”。阿英谈工厂文艺工作干部的修养问题时提出：“所谓艺术工作，主要的就是一种心理分析的工作，斯大林同志称艺术家为心灵的技师，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譬如二流子工人的转变，我们在作品里、舞台上、连环图画中，固然要说明他转变的原因，经过那一些事态的变化，但主要的，却是要通过这些事态，说明他心理上有过那一些变化，经过那一些斗争。”在《怎样写转变？》一文中，他更明确反对僵化和套路化的写法。

阿英设想他们在大连的工厂文艺工作为一次实验，从这次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工人文艺实践的具体历史形态。建新工业公司是华东局的军工联合企业，人数多、规模大、条件好、技术高，下属十几个大小工厂。1946年夏，阿英与美术教授刘汝醯、舞蹈家吴晓邦、戏剧家沙惟等十人从华东来到大连，他们到甘井子厂区建新工业公司宣传科成立文艺研究小组，实验如何在工厂开展工人文艺活动。在大连一年多时间内，阿英举办了“建新工业公司工友绘画展览会”，组织“关东艺术活动周”，创办《建新报》，后在天津主编出版包括大连和天津工人创作为主的“工厂文艺习作丛书”二十余种，为新中国工厂文艺运动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阿英日记手稿记录了大连工厂文艺工作的具体历史语境。阿英清楚地认识到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面向工农兵大众，但一段时期内，“我们没有大的城市”，“我们所蓄积的，只是农村文娱工作经验，和部队文娱工作经验”，大连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城市，天津更是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阿英到达大连之后，很快就发现，“我们的工作重点，也从‘农村’转向了‘工厂’”，“到工人当中去工作，不仅对复杂的工厂环境要有深切的了解，就是在工作作风方面，也必须有新的改变和新的发展”。阿英的这一看法或许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这一历史背景有关，属于一种后知者叙述，但不可否认其开启了新中国工厂文艺工作的先声。

工厂文艺是新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工人通讯员运动，更主要还是由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1949年以后，大连、上海、天津、鞍山等工业城市兴起了工厂文艺运动的热潮，这是新中国文艺制度建设的重要实践，但很长时间以来，学界相对忽略了对此的研究。阿英对工厂文艺创作、观众（读者）、文艺生产等均有细致的总结和论述，我们相信阿英日记手稿的公布，将进一步推动对新中国工人文艺运动的深入研究。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学思想史论（1921—1949）”（项目编号：21AZD135）阶段性成果］

阿英在天津的22天

□鲍国华

2025年3月，钱荣毅先生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之《阿英日记手稿》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阿英先生的日记手稿首次大规模地影印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和文献价值，还为研究1940至1950年代的中国文学以及阿英本人的生平经历，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1949年春，阿英先生完成了对大连工厂文艺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后，曾在天津短暂停留，随即赴北平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13日，阿英从北平来到天津工作，直到1951年夏天调回北京，担任华北行政区文联主席。在天津近两年的时间里，阿英先是就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军管会撤销后，改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后又当选为天津市文联主席兼戏剧家协会主席，领导天津解放初期的文化工作。阿英在文学艺术诸多领域的广泛兴趣和突出成就，以及出色的组织和管理能力，使他成为以上职务的不二人选。他为天津从解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次影印出版的《阿英日记手稿》，包括《平津日记》，其中1949年8月13日至9月3日一段，撰写于天津。这22天的日记，较为详尽地记录了阿英在天津的工作和生活。

阿英于1949年8月13日抵津，当天即撰写了日记。此后逐日记录，至9月3日不曾中断。阿英记日记的习惯，与鲁迅相近，惜墨如金，如流水账，只是简要记录一天之内经历的人和事，大多以简笔书之，绝少铺陈渲染，更不披露自己的感受和心境，可谓质朴无华。对日记而言，文胜质则史。阿英日记又不避琐屑，事无巨细，均予以记录，体现出鲜明的日常性。独具一格。这类日记的拟想读者，往往只有作者自己，因此不会曾将自家话剧剧本《洪宣娇》改编为京剧），又是其作为文化事业领导者的职责所在，因此戏曲在阿英日记中有较多记载。8月15日，“李少春、袁世海、翁偶红（虹）一行来访”。8月18日，“同去皇宫访（李）少春，不在，到中国戏院，又不在，到国民饭店，亦不在，乃留条”。8月19日，“与云儿母女去中国（大戏院）看少春及世海（野猪林），杰作也。”8月25日，“收到梅芦芳信”。8月29日，到平安戏院看戏，“戏码为杨韵（荣）环《起解》《会审》及谭富英、小（筱）翠花《坐楼杀媳》（替）”。

除记录繁忙的工作，以及与天津市委市政府及文化部门的管理者和文艺界人士的频繁交往外，阿英和亲友的日常生活，在这22天的日记中也有详细记录。8月14日，即抵津的第二天，阿英与艾青至罗斯福路（今和平路）漫步。8月17日，“到文艺处借二万元，为买沉维他命B、C，用去一万三千元。又买杂物、香烟等，三四项尽矣”。8月21日，“早饭后，至文艺处开会，买橘汁一听，三五〇元……云儿昨夜食药后，今日已较好。食橘汁后，病势更减轻”。对家人的关爱，使阿英这一天的日记一改借墨如金的风格，琐铁之情，洋溢其中。同时，日记对物价的记录，也成为研究天津解放初期社会生活史的可靠史料。由于正值暑热，日记中还有多次“食冰”的记载。如8月26日，“至起士林（天津拥有百年历史的西餐店，以法式、俄式西餐和各类西点、冷饮知名）食冰而归”。8月27日，“与云儿母女到罗斯福路漫游并食冰”。8月28日，“吃冰淇淋”。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阿英工作繁忙，在短短22天的日记中，却有多次买花的记录。如8月18日，“归途中，买华（花）一束，插瓶”。8月21日，“与云儿母女同访严奚夫妇，同至市政府公园散步，十一时买花而回”。8月22日，“买夜来香一束而归”。天气炎热，工作紧张，但生活情趣和质量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日记对阿英的个人兴趣爱好也有所记录。如8月14日，“误将人间兽身�地，碎，须待补缀，终不成完品矣。似乎祥然有声，痛惜之情，显现其中。8月21日，“登记在平新买书籍……晚，看画拓。”8月22日，“登记在平新买书竟”。8月29日，“灯下，重看拓片，选出十件，待其回平却价，又录其会目备考，至三时许始就寝”。9月3日，“启第十箱，取出造象［像］、瓦、砖、铜器拓片各一部加以整理。至一时许完”。于文学艺术，须臾不离，情之所钟，跃然纸上。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呈现出阿英在文学家、学者、收藏家和文化事业领导者以外的更为朴实亲切的形象。阿英之所以在文艺创作（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文艺批评、学术研究（近代文学、民间文学）、书刊和文物收藏、文化组织和管理等不同领域均取得引人瞩目的杰出成就，除天赋和努力外，也和他广泛的兴趣、对家人的关切和对生活的热爱密切相关。《阿英日记手稿》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也使阿英的形象更为鲜活可感。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艺旗共举创新天”

——阿英日记手稿整理有感

□钱荣毅

2025年3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阿英日记手稿》，这部影印本中收入了祖父阿英的《烟台日记1947》《大连日记1947-1948》《沈阳日记1949》《平津日记1949》和《华北文联日记1953》。我在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领导、专家们共同整理祖父日记的过程中，亲手触摸这些粗糙泛黄、满载历史沧桑的手稿，仿佛穿越到那一个个历史现场，看到祖父和那些文学前辈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努力开创新中国文艺道路上，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身影。

祖父一生的经历，是同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从参加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安社”，到经历“五四”和“五卅”运动的洗礼，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被军阀通缉逃亡上海后，在蒋光慈、高语罕等指引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命返回家乡芜湖组织起义迎接北伐军，根据党组织安排和李克农等跨党组建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与蒋光慈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1930年，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左联常委。1933年，作为党的电影小组成员，为左翼进步电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担任《救亡日报》的编辑主任，《译报》副刊《大家谈》的主编。在“孤岛”开办风雨书屋，出版抗日杂志《文献》，大量刊登毛主席、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还不顾风险出版了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征途的《西行漫画》（即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黄镇所作《长征画集》）。在租界当局禁止反日活动的管制下，他连续编演了《碧血花》（《明末遗恨》）《海国英雄》《杨娥传》《洪宣娇》等历史剧，以明末清初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的英勇事迹，鼓舞“孤岛”人民的抗日斗志。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上海租界，祖父在地下党安排下率全家奔赴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抵达新四军军部后，他创作的第一篇纪实长文《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实地采访，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苏北阜东前后修筑同一条海堤的失败和成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了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才是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军队和政权。此文也成为这一红色史迹最全面、最详尽的原始记载。这期间，祖父参与发起陈毅代军长倡办的湖海艺文社，助力各界爱国人士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还先后主编《新知识》《江淮文化》杂志和《盐阜报》副刊《新地》，并在新四军三师《先锋》杂志上发表多篇抗日题材的文章。抗战胜利前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和新四军三师张爱萍副师长的提议，他创作并和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队排演了话剧《李闯王》。为增强戏剧效果，结局采用李自成“逃禅”一说，在“暮鼓晨钟”的警醒声中落下帷幕，使李闯王成败的历史教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李闯王》剧本在1949年被选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列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优秀革命文艺创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祖父和文艺研究小组深入大连建新工业公司进行工厂文艺活动的探索和实践，并在其后天津工作期间和华北文联工作期间持续进行这方面实践和经验总结，写出《工厂文娱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为开创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做了有益的探索。

1954年，祖父担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致力于晚清文学文献的整理，把他多年搜集的国人撰写的有关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和反美侯氏事件运动的文学作品选编成《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丛书，共5种7册。同期，祖父编著的《晚清文学丛钞》也出版了9种19册，涉及小说、小说戏曲研究、说唱文学、传奇杂剧、域外文学译文、俄罗斯文学译文等。这两套丛书约700余万字，为研究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文学和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鲁迅先生给他写信道：“中国一百来年的耻辱，因人民革命的胜利而成为陈迹，中国人民一百来年中所酿成的爱国主义精神却葛藤编五部大书而光彩焕发，万年常新。”茅盾先生也称赞：“您这工作，嘉惠后学匪浅，甚为钦佩。”

祖父重视继承弘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梅兰芳先生去世后，他担任《梅兰芳》传记纪录片的编剧并参加拍摄，全面再现了这位京剧艺术大师的高洁风骨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1963年，受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委派，他主持筹备“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展览汇集了全国2000多件展品，分成六个展室，展示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世、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红楼梦的版本和红楼梦时代的参考文物以及以红楼梦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规模最大的一次展会，3个半月展期中接待观众21万余人次。1964年，根据陈毅副总理建议，调整部分内容，以红楼梦展为名赴日本展出，轰动东瀛，增进了日本学者和众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两国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

我在整理祖父日记手稿中感触最深的，一是他作为父亲失去爱子后的无尽思念。1947年3月，祖父的长子钱毅，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在江苏淮安敌占区采访时被捕不屈，英勇就义。在经历最初剧烈的悲痛后，在中秋月圆之时、在春节阖家团圆之际、在突然收到出版的钱毅遗作《怎样写》的时刻，他仍不时在日记中写下他的哀思。他既为爱子宁死不屈的英雄壮举写下“浴辛仁、游于义，当年熟读南冠草。不负国、不亏党，今朝重谱正气歌”的挽联，又在日记中展露出作为父亲失去爱子后余生长存的痛惜之情。二是不论身在何方，他都与书形影不离，处处相伴。在胶东、大连和北平的旧书铺、杂货铺和地摊，都有他埋头觅书的身影，不仅为自己买书，买书奉送友人，也时时见于日记。他对海书的经过和购买的书目，都作了详细记载。迫于经济状况，借钱买书是常事，他自己也感慨写下：“为买书而负债累累矣。”尽管如此，他仍然乐此不疲并终其一生。三是祖父处世的一贯作风，为新中国工作者的高洁风骨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1963年，受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委派，他主持筹备“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展览汇集了全国2000多件展品，分成六个展室，展示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世、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红楼梦的版本和红楼梦时代的参考文物以及以红楼梦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规模最大的一次展会，3个半月展期中接待观众21万余人次。1964年，根据陈毅副总理建议，调整部分内容，以红楼梦展为名赴日本展出，轰动东瀛，增进了日本学者和众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两国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

我在整理祖父日记手稿中感触最深的，一是他作为父亲失去爱子后的无尽思念。1947年3月，祖父的长子钱毅，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在江苏淮安敌占区采访时被捕不屈，英勇就义。在经历最初剧烈的悲痛后，在中秋月圆之时、在春节阖家团圆之际、在突然收到出版的钱毅遗作《怎样写》的时刻，他仍不时在日记中写下他的哀思。他既为爱子宁死不屈的英雄壮举写下“浴辛仁、游于义，当年熟读南冠草。不负国、不亏党，今朝重谱正气歌”的挽联，又在日记中展露出作为父亲失去爱子后余生长存的痛惜之情。二是不论身在何方，他都与书形影不离，处处相伴。在胶东、大连和北平的旧书铺、杂货铺和地摊，都有他埋头觅书的身影，不仅为自己买书，买书奉送友人，也时时见于日记。他对海书的经过和购买的书目，都作了详细记载。迫于经济状况，借钱买书是常事，他自己也感慨写下：“为买书而负债累累矣。”尽管如此，他仍然乐此不疲并终其一生。三是祖父处世的一贯作风，为新中国工作者的高洁风骨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阿英与第一次文代会

□王秀涛

1949年7月6日，阿英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

阿英参与了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召开过程中的诸多工作，这在他的日记中有大量的记载。通过阿英日记和第一次文代会的相关材料，梳理阿英在文代会期间参与的几个重要活动，从中可窥见诞生于新中国文艺的准备工作和某些新的文艺倾向。

1948年12月，阿英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前往北平。4月14日到天津，5月10日离津，赴北平中组部报到，并作为核心人员之一在北平参与筹备第一次文代会。阿英日记中多次记载他参与筹备活动的情况。比如5月13日晚同夏衍、周扬等人到中南海和周恩来商谈文代会的事宜。14日回天津后，19日返回北平，主要任务是参与筹备第一次文代会。26日晚同周扬赴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文代会的筹备情况。此外，阿英担任了文代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主席团常委，多次参与文代会的预备会、主席团会、主席团常委会、党员大会，7月6日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文代会结束后担任文联筹委会的主任委员，文联成立后担任指导部的负责人。一直到8月13日离开北平。

阿英作为第一次文代会主要参与者、组织者，参与了非常多的具体事务，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作值得介绍一下。

一是文代会提案的整理。从大会召开一直到8月12日，阿英日记里记载了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整理提案的情况。7月14日，“晚饭后，至东安市场穿军衣样子。归后整理大会提案”。7月15日，“九时，去中南海，取得艾青同志所整提案，然后去陈璃厂”，“归后整理提案目，至三时许完，送文代会付印，开党组会”。7月16日，“大会第十三天，讨论提案”，“整理提案至午夜”。7月17日，“晨起后，继续整理提案”，“大会第十四天，选举及继续讨论提案”。7月18日，“九时至怀仁堂，开提案审查委员会”。7月23日，“整理大会提案，至午后一时始完”。7月29日，“晚饭后，整理提案完”。在7月18日的文代会上，“由阿英报告提案整理经过，大会收到提案共九十八件，归纳成组织工作、创作与出版、学习与研究、奖励与纪念、福利事业及其他等五类二十四项。报告毕，即开始讨论”。

阿英整理的《大会提案总目》涉及的议题非常丰富，比如：组织问题、艺术教育、比对文艺工作、文工团、海外文艺、儿童艺术活动、出版、创作、评选奖励、纪念、文物与资料、生活待遇等等，构成了文代会一项重要内容。郭沫若在大会开幕词中说，“在大会上还有很多详细的报告，周密的提案，我们从这些报告和提案中，细心地分析和综合，我们相信一定更可以得出很可宝贵的结论的”。这份提纲对于理解第一次文代会和中国当代文艺的发生都有着重要的价值。首先，因为广泛的代表性和合法性，提案显示了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文艺工作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新中国文艺的走向，几乎涵盖了新中国文艺基本方向确立的状况下，提案涉及诸多具体问题和待解决的命题，既有宏观的问题，又有具体的问题，这从此后当代文学的具体开展过程中能够得到验证；再次，提案整体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一方面基于历史的总结，另一方面又关乎未来的可能性，是文艺发展史转折的鲜明体现。

从提案的内容来看，涉及的议题非常丰富，而且梳理这些内容可以发现存在内在的相关性，体现了当代文艺的几个结构性维度，如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官方与民间等等，但从总体上看，显示了当代文艺的组织化和体制化的倾向。文艺事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个别的事业，而是整体性的事业，“组织起来”无疑是最为鲜明的文艺趋势。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里提到了文艺组织化的问题：“这次文代大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象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材，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是大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门的组织成立。”

二是阿英关于工厂文艺的报告。文代会筹备会的演出委员会下设的学习组共组织了两场报告，每场参加的人数约五百人，一场是6月15日在解放影剧院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报告，另一场是6月20日举行的工厂文艺工作报告，由阿英作报告。阿英在日记中记载：“八时半，与柯灵同志同去建国东堂报告，题工厂戏剧工作，至十二时，仅及三之二，遂略去。”

两场报告涉及部队与工厂文艺，这和第一次文代会所要确立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是密切相关的。工农兵代表在文代会中得到极大的礼遇。此次会议邀请了特殊的代表：农民英雄李秀真、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代表李健、北平被服厂缝纫女工徐世荣、第七十兵工厂工人李家忠、图门机务段司机劳动英雄王祥、浙藏路保护器材有功的铁路职员李昂等。会后，在大会的招待饭席上，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等文艺工作者和女工农代表坐在一起亲切地交谈。7月10日，文代会还举行了工人联合晚会，由工人组成的剧团参与表演，被服二厂的红旗剧社、西山职工业余剧团、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业余剧团等团体参与演出。工农兵代表要邀参与文代会预示了工农兵在新中国文艺中的重要位置，工人业余剧团的演出也预示着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演出委员会之所以邀请阿英做工厂文艺报告，是因为阿英在工厂文艺运动中的巨大贡献。阿英日记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工厂文艺的内容，可以说阿英是工厂文艺重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947至1948年间，阿英就在大连指导工厂文艺活动，并依据大连期间指导工厂文艺的经验，写成《工厂文娱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为新中国的工人文艺活动提供了重要经验。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大连工人创作的100多个剧本、40多首歌曲、150余幅美术作品和375幅反映大连工人文艺活动的照片在展览中得到展示。

担任天津文联主席期间，阿英采取多种方式推动工农兵文艺的发展，扶植工人作家。例如1950年，他主编了一套以工厂为主要描写对象，以工人作者为主创人员的“工厂文艺习作丛书”，包含《工人写作讲话》《工人创作画》《工厂美术工作与新闻工作》等作品。《工人写作讲话》与《工人创作画》是线小惠在父亲阿英指导下完成的，阿英在书的《序》中说：“一九四七年撤退至大连以后，小惠同志和我们一同下到厂里，从事工人文娱工作，迄今已是两年。他根据在厂工作的经验写了两本创作方法的书，一部是三联书店的《怎样画》，一部就是这本《工人写作讲话》。正是因为阿英的努力和实践，工厂文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阿英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戏剧创作、文艺批评、文学史料等方面，他在新中国文艺体制的建立、工厂文艺和人民文艺的实践等方面同样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这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却很少被提及。《阿英日记手稿》作为重要的资料，无疑为深化阿英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也会进一步拓展阿英研究的话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